

忆原潮阳县委书记李诗铭同志

林瑶钦

李诗铭同志在潮阳工作期间，给潮阳广大干群留下很好的印象。他作风正派，深入实际，关心干群，艰苦朴素，任劳任怨，不愧是一位好领导干部。

我在他的领导下共事时间虽不长，但有几件事情却令我永远不会忘记，值得好好回忆。

李诗铭同志在潮阳工作期间，经常到基层蹲点或到各公社检查指导工作。他下基层时，常带着几帖中药，一下去就是五六天，有时连上级召开电话会议，他还要电信部门接到下面收听。一九七七年七月的一天，我在河溪公社蹲点，因有急事须向他汇报，刚好他下乡到和平公社，我起床后由县委交通员吴良同志用摩托车从河溪载我赶到和平公社，但李书记起床后已到外面去了。公社同志告诉我：李书记可能去农科所。我即赶到和平农科所，果然他与卓圣泰、詹昭成等同志正在田间劳动，我只好和田头向他汇报后，一起回公社吃早餐。

他下基层后回到县城时，晚上大多数时间都在保密室或

房间阅批处理文件和人民来信或到县城看望一些体弱多病的老同志。有一次，他下乡回到县城已是晚上九点多钟，外面天气非常寒冷，他穿上大棉衣，给我打电话，说孙贺田同志有病在家，要我并告知县委副书记刘俭同志跟他一起去看望。到孙贺田同志家里，诗铭同志详细询问其健康情况，还问其家属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

一九七七年九月的一天，地委罗晋琛书记到潮阳找诗铭同志谈话，要调他到汕头专署农业办公室工作。事后诗铭同志对我说：“我可能要走了，你叫部里同志把叶常青同志的档案送来给我，争取在我离开潮阳之前，把他的问题落实……”我说：“常青同志的档案材料，可能不止十斤，你有那么多时间可以看吗？”他说：“争取看看，能办的事要争取办妥。”

有一次，他下基层几天没有回来，组织部的同志通过电话向他汇报，说上级通知宋保金同志调回老乡工作，明天就要起程。李书记接到电话后便从仙城公社赶回县城。回到县城已是晚上十时左右，他打电话约我一同到法院为宋保金同志送行。到了法院，他对有关情况一一作了询问，如：车辆是否落实，还有什么事情需要解决等等。宋保金同志及其家属对李诗铭同志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深为感动，一再表示感谢。

一九七七年四月的一天下午，我们和李诗铭同志一同到河浦外围盐田检查生产情况，在大堤走了几个钟头，没有到公社去。回到县城，已是晚上六点多钟，当车开至万福桥时，诗铭同志要司机把车开往牛头山医院，看望正在住院治疗的县水利局工程师钟煌高同志。钟同志属重病号。诗铭同

志到病房后坐在钟同志的病床头，详细询问病情，一再劝他安心治病，并问其家属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当其家属反映这几天买不到“水解蛋白”时，他即派秘书马上开车到县医药公司请经理想办法，并再三吩咐，一定要想办法买到，哪怕是高价，也要购买。

在探望钟煌高同志回来的路上，诗铭同志对我说，老钟同志对潮阳的水利事业贡献很大，练江整治、海门湾大闸、南山截流等的主要工程，都是他主持设计及参予施工的。他现在病危，我们要想尽一切办法抢救，县委的态度是：只要他能多活一天，我们就要抢救一天；能多活半天，我们就要抢救半天。总之，要不惜任何代价。

一九七七年春节前夕，诗铭同志找我商量，他提出大年正月初四上午，要在常委会议室开欢送会，欢送刘俭等四位同志调往汕头专署工作，并说欢送会用的香烟、糖果，他都已准备好了。即是在春节慰问物资中，由县委办公室留下一条大前门香烟和一些糖果。并说那天中午由食堂做饺子和几个菜。我问他伙食费用怎么处理，他说酒由他自己负责，其余款项结算后按参加会的常委分摊。他自己则先出 10 元给食堂，嘱买本县酒厂生产的三瓶群英酒（每瓶 2.8 元），存款则买啤酒。伙食费结算后，按参加欢送会的常委分摊，每人负责 3.85 元，由办公室总务发工资时代收。

一九七八年冬的一天下午（当时李诗铭同志已调往汕头专署农业办公室工作），我和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张明远同志到汕头专署为曾在潮阳工作的几位老领导落实文化大革命有关政策。我们先到陈宏、方文瑞同志办公室，为他们落实政策的事情进行座谈。因诗铭同志没有在办公室，我们五点多

钟才到他家里，但等到六点多钟他才回家。我们问他为什么这么晚才下班，他说为了解决揭西县修水利补贴粮食问题，因揭西的同志从乡下专程来汕，应尽量把事情办妥让他们回去，故此，就自己到粮食局协助他们办理。

接着，我们向他道明来意，说是受袁应潮同志委托，代表县委为他落实政策，并把“平反书”送给他。诗铭同志在座谈中对他在文化大革命被批斗、游街、坐牢和下放劳动等等，没有一句怨言，总是说“要向前看”。我们再三征求他还有什么意见，他一再表示没有什么意见，多谢县委关心。

当我们向他提及县常委经研究决定给他补助药费 400 元时（因当时按制度规定不能带现金，该款项应由银行汇至汕头专署农办），他婉言谢绝，说药费补助款我千万不能接受，我不会困难。他要我们转告县委书记袁应潮同志，看看能不能多挤点资金，和这几百元凑在一起，帮助解决海门镇那些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打的渔民的生活困难。当时由于诗铭同志再三表示不接受补助款，为尊重他的意见，我们也就没有把款汇去。

从上面的这些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李诗铭同志高尚的思想品德和务实的工作作风。他虽然与世长辞，但他的精神风范却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学习！

迷失半个世纪的烈士

周艾黎

庄儒邦：1922年生，1937年赴泰国，1939年到延安，1940年在抗日军政大学参加中国共产党，1943年秋在抗日前线牺牲，1993年11月落实烈士称号。

庄儒邦的亲属终于在1993年11月8日，领到由潮阳市民政局签发的“革命烈士证明书”，迷失了半个世纪的庄儒邦，终于以光荣的“革命烈士”身份，被寻找到了。

庄儒邦，原籍广东省潮阳鹤联村人，1922年出生。少年时期就读于外祖父乡里的植英小学，1937年夏高小毕业，即随祖母去泰国。在曼谷，庄儒邦一面继续求学深造，一面在父亲庄介岩开创的庄丽华金店学做生意。当时，正是祖国抗战期间，庄儒邦与一批进步同学，虽然身处异国，却十分关心祖国、民族的生死存亡，积极投身华侨抗日救亡运动，参加读书社，开展宣传工作。在革命思想教育下，庄儒邦进步很快，1939年初便结伴回国，奔赴革命圣地——延安。

庄儒邦是背着家庭离开泰国的，但他却没有忘记家乡的母亲。当他被安排在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后，便给远在南方农

村的母亲写信，报告自己已回国读书。那时虽是国共合作时期，但蒋管区的人对延安、对共产党还是有所避忌的，所以庄儒邦去延安“读书”的消息，生母周美娥就不敢张扬，只是耽心儿子经济拮据，请求老父亲代她设法寄去十个光洋。后来，十个光洋被如数退回，同时附来一封盖有“抗日军政大学”公章以及校长林彪的签名印章的信函，内容答复周美娥说：庄儒邦在抗大学习期满，已分配到部队工作；部队人员变动多，流动性大，一时查不到庄儒邦在何部队，在何地方，款项无法转去，特退回。信中还说庄儒邦是到了革命大家庭，亲属可免担心其生活，毋须汇寄款物。最后还表彰周美娥生养了好儿男，并说“日本鬼子投降之日，就是抗战人员一家团聚之时”。这封信，后来因为时局板荡，被周美娥烧掉了。

自此以后，就没有庄儒邦的消息。抗战胜利以后没有消息；就是解放以后，新中国建立了，照样没有消息。

本来，在 1949 年 10 月，周美娥同庄惠华母女二人，相信不会太久就可以同庄儒邦团聚，脸庞上时不时流露出喜悦的神情。周美娥甚至想：儿子离家十二载，近 30 岁的人了，回家来是单身一人呢，还是携来家小？母亲的幻想是很甜美的，但已经读初中的女儿，在学校里听过宣传，也从报上读到有关共产党即将在农村实行的政策，心里不禁蒙上一层浅浅的阴影。有一次她从学校回家，就把这些消息静静地告诉母亲。母亲也就忧虑起来，还自言自语：要是抗大林彪签名的那封信不烧掉，证明我们是抗日军人家属就好了。但最重要的是希望庄儒邦回家来。

后来，周美娥碰到了一系列严峻的问题：老父亲在政局

动荡之中出逃香港，娘家一个弟弟据说在临近解放时埋掉一支短枪被民兵拘禁，娘家被定为恶霸地主正在接受清算；自己的家庭虽然只有母女，其余家人都在海外，但家中有田有屋，划为华侨地主成份，是不为过的，就是不知道贫苦乡亲会不会来清算。这时候，周美娥内心最是矛盾：她既希望儿子回来，家庭或许会得到多少优待；但又担心儿子真的就在这时候回来而受到家庭问题的拖累。这种矛盾心理一直维持到土改后相当一段时间才消失。

正是这样，周美娥便不敢积极寻找儿子。然而，母子之情又令周美娥时时怀念。因此，庄惠华不止一次代母亲上书中共中央组织部、解放军总部请求查询庄儒邦的下落，有关部门始终无法提供确讯。过了很长时间，连庄儒邦究竟活着，还是已经故去，都无法回答。在这种情况下，周美娥母女只好无望地接受庄儒邦已不在人间这一未经证实、却绝对是真实的结果。庄儒邦归家无望，周美娥伤心了。老人终日以泪洗面，当 80 多岁的时候，双眼便因哭泣过度而失明，到了 90 岁上，双耳又失聪。周美娥在无休止的思儿中苦熬岁月。

1990 年，庄惠华从《泰国归侨英魂录》（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编辑、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中读到《他的热血洒在华北土地上——怀念庄儒邦》一文，心间不禁怦然一震，半个世纪下落不明的亲哥哥，终于有了信息。

文章作者关伯标是这样记述的：

1939 年 3 月 16 日，庄儒邦偕同胡逢杰、陈展元、关伯标等人一起离开曼谷，经越南回国，由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安排去延安。他们在重庆和西安时，受到董必武、林伯渠同志

的热情接待和欢迎，赞许他们是华侨青年的表率，勸勉他们在延安好好学习，争取为抗战做出更大的贡献。

到了革命圣地延安后，他们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庄儒邦被分配在第四大队学习，表现十分突出，既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又刻苦进行军事训练；不论是开荒生产，还是百里行军，他无不积极响应，身体力行。正是这样，庄儒邦于1940年抗大毕业前夕，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0年，庄儒邦在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毕业。他响应党的号召，坚决要求上前线抗日，被分配到晋察冀军区第四军分区战斗部队。

1943年秋季，日本侵略者在晋察冀地区进行疯狂大扫荡，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激起了晋察冀军民的强烈反击，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就在这时，庄儒邦在河北省阜平县温塘村的突围战斗中，光荣牺牲。他把鲜血洒在华北战斗的土地上，时年 21 岁。

庄惠华获得此重要的线索，百感交集，既震惊，又酸楚，还疑惧。她是多么希望书中这个“庄儒邦”就是自己的同胞手足，但又惧怕他真的就是兄长，因为她忍受不了兄长牺牲的悲惨场面……她将心比心，所以这一消息，并没有贸然说给母亲知道，老母亲毕竟已是 90 高龄的人，再也经不起感情上任何过于刺激的欢乐和悲哀。她只想进一步查证，排除同名共姓，证实书中所记的“庄儒邦”就是兄长，并经有关部门确认之后，就附在老母耳边大声告诉她：“大哥有下落了。”也就足以安慰老人的心了。

在北京泰国归侨联谊会《英魂录》主编帮助下，庄惠华找到文章作者关伯标，进一步查询当年庄儒邦的具体情况，

以便确认。据庄惠华说，当她踏进关伯标同志在广州农林下路高教局大院内的宿舍客厅时，已届古稀之年的关老前辈第一句话就是“你长得像庄儒邦”。接着，他详细谈了当年他们四人回国参加抗战的经过，说他是1940年和庄儒邦在抗大学习结束后分手的。1943年底，日寇大扫荡以后在河北曲阳县一处乡村偶遇胡逢杰，得知庄儒邦壮烈殉国的消息。关老说：在曼谷时，他和庄儒邦并不认识，二人是在火车上才认识的，后来才知道庄儒邦是曼谷越三振地区有名的庄丽华金店老板的儿子。还说熟悉庄儒邦情况的是胡逢杰，庄儒邦回国之事是由胡逢杰经办的，关老答应立即向定居武汉的胡逢杰同志通报情况。他说：“胡逢杰是当年我们回国小组的组长，是我们几个人的兄长，1943年他就写过悼念庄儒邦的文章，刊登在晋察冀军区的《抗敌子弟兵》报上，这次《英魂录》集稿，原定由他撰写的，因为他身体不适，才由我执笔。”

至此，庄惠华完全肯定书中这个“庄儒邦”就是自己的同胞手足，她马上向胡逢杰老前辈发信。感谢他不忘战友旧情，并道明由于悼念文章而使他寻找到数十载杳无音讯的亲哥哥庄儒邦。接着，自1991年开始，庄惠华向各有关部门送出报告，请求核查落实庄儒邦革命烈士称号，庄惠华在报告中陈情：若能在90高龄的老母健在之日，落实庄儒邦是革命烈士，使她知道自己生养了一个为国为民、英勇献身的好儿子，她是革命烈士的光荣母亲，将是人生的最大慰藉。

在经过三年各方协作之后，1993年11月8日，由广东省民政厅批准，潮阳市民政局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革命烈士证明书”，于是，迷失了整整半个世纪的庄儒邦，堂堂

正正成为光荣的革命烈士。

当庄惠华流着眼泪手捧烈士证明书，站到老母亲床前，在老人家耳边大喊一声：“妈妈，大哥的下落找到了！”老人“哦哦”二声，是表示已经听到了，还是别的什么意思，庄惠华无从知道。

就在庄儒邦获得落实烈士称号后不久，周美娥病了，1994年4月5日寿终正寝，享寿94岁。

苗茁潮之阳 魂系玉门关

—— 怀念挚友郑然

萧思齐

郑然，原名郑铿然。潮阳市棉城镇赤杜园人。他是五十年代初，随着开发大西北的洪流，投身石油建设的潮阳人。他英年赴西北，像一棵芨芨草，茁壮地植根塞外，一扎就是五十个春秋。他青春的热能融和着他的血汗，静静地注入纵横交错的石油管，从玉门关外，流向祖国大地，一路欢歌：我为祖国献石油……

2001年3月23日，他猝逝的噩耗传来，如巨雷贯顶，泪水一时泛滥双眸，脑际突然浮现十个字：苗茁潮之阳，魂系玉门关！如烟往事，激流般冲出记忆的闸门，泻出胸臆……

郑然是我中学的同学。从1946年春，我们在潮阳县立联合中学同窗三载。郑然的父亲郑遗山先生，是我父亲萧遥天先生小学的老师；后来，遗山先生又与父亲在汕头英华学校同事。父亲与其堂兄已故马华作家郑卓群（铁抗）又是同窗文友，结下了一段可泣可歌的笔墨情缘。其姐若贤是我砚

姐，其弟适然同有文艺之好，热线不断，鱼雁频通至今。因此，我俩之间的关系，堪称父交子往，亲如一家。

1946年春，在联中初识郑然，因有上述一段不寻常的关系，很自然地就十分默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英语课特别出色，为全班之冠。遗山先生是一位学识渊博的英语教师，郑然有此表现乃受家学熏陶。他是班中篮球队的右锋，擅长中距离投篮，撞球板而命中球篮。假日，我们在他家的西厢集体温习功课，为了调节精神，我们用一块床板垫两只条凳，成为简易乒乓台，大家左右抽球为乐。郑然的削球特别狠，同伴往往难以招架。校里成立歌咏团，我俩都参加，同唱男低音，因为同个声部，两人身高相近，练习和演出，都站在一起。郑然的音色，浑厚中带有共鸣音。遗山先生对子女的知识需求，敢于投资——从汕头购了一批开明书店出版的新文艺小说。如巴金的《家》、《春》、《秋》、茅盾的《子夜》、《腐蚀》……郑然当然是先睹为快。他热情地介绍给几位好友，互相传阅。每部小说大家读完了，假日，在郑然家集中讨论，各抒己见，并写心得体会。这种讨论，一开始就形成了制度，风雨无阻，这些新文艺思想的注入，又磨砺笔头，为我们往后的学习写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51年秋，郑然在汕头华侨中学读高中二年，时值开国伊始，各方急需建设人才。郑然毅然走出校门，报考西安石油工业专科学校，获取录，即背起行装，搭上西去的列车，进入又一个校门。

1956年秋，我在水利部广州勘测设计院《珠江水利》报任编辑，曾写了一封信给他。其时，他已毕业，分配在玉门油矿注水大队搞技术工作。他给我寄来了一封文情并茂的

长信，他在信中仍像少年时代一样，给老朋友坦诉衷曲：“我的奋斗目标是工程师和业余歌曲创作”，但也流露了不能实现少年时的心愿——终生从事文学创作的矛盾心情；并畅叙参加工作后的详细情况。其中有对沸腾的石油城的生动描写，更多的是对参加工作后的甘苦、拼搏的描述，字里行间，跳动着一个青年人炽热的心声。他说他已经有了女朋友，叫李素英，山东人。由于业务和社会工作的关系，彼此志同道合。若干年后，他俩结婚了，证实了他的话：他俩在事业上，互相切磋，共同拼搏，在生活上，相濡以沫。夫人事业心很强，中共党员，多次被油田评为劳动模范，曾任玉门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党委副书记。是一对令人羡慕的称心伴侣。此时，我正在海南岛松涛水库工地上进行新闻采写，整天与勘探队员们爬山涉水，为水利事业的发展乐献绵力。自感郑然在北方，我在南岛，南北共唱一首歌，同为祖国献青春，乐也何如！以后的通信，更是捷报频传。1958年，在“大跃进”的热潮中，他努力搞好技术工作，又以充沛的激情，参加反映玉门石油工人生活的《玉门油矿大合唱》的作曲，并任指挥。此时，他已是该矿业余文工团的副团长，亲自带队到兰州参加甘肃省第一届职工工业余文艺会演，亲自执棒指挥。这个节目，一炮打响，获一等奖。此时的郑然，年仅25岁，正是年壮力强，浑身是劲。他既是技术改革的尖兵，又是业余文艺创作的骨干。

1968年夏，郑然携妻带女，南来省视年迈的双亲。回玉门途经广州，我俩有几个小时的聚会。在广州的惠如楼，我们一边品尝着粤式菜肴，一边天南地北侃大山。此时，他经过岁月的风霜，工作的锤炼，显得深沉老练。我俩同龄，

我童心未泯，相比之下，他毕竟比我成熟了。匆匆会晤，依依离去。不久，狂飚卷来，听说，郑然因为人坦荡，平时与朋友交谈中，对当时的社会现实说了一些真话，而这些话，经过历史的验证是正确的。加上有海外关系（事实，是其兄旅居香港，当某公司高级职员），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一夜之间，他从工程师的座位上跌入深邃的矿井中，降为修井工人。整天扛着抽油杆，来往于山岭间的各个油井上，修理油井，清理井下堵塞物，汗水与泥浆浑为一体，一干就是十年！他默默干活，静静思索，偷偷学习技术知识，蓄芳待春时。终于，盼到了“四人帮”倒台，拨乱反正，党的阳光照亮了郑然的心坎。郑然抖掉了身上一切不白的污垢，抖擞精神，重度芳华。尽管此时他已届中年，但一投入工作，就不能自己。他曾到过美国、法国考察，吸取了国外的先进经验，结合自己的业务实践，尤其是十年在第一线与工人同劳动，对油井性能的深切体验。他带着这个问题，跑遍了玉门油矿的工地，作调查研究，把实践提升到理论的高度，写了二十多篇学术论文。其中一篇《关于井下套管损坏原因的探讨》，获石油工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该文的论点应用在油田生产上，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因此，他跃上了高级技术职称的油矿总工程师的台阶，又担任了玉门老君庙石油研究所所长。还担任了一些社会职务，如玉门市侨联主席、甘肃省侨联副主席。据他的亲属反映，此时的郑然，思想相当活跃，节假日都很少休息。多年来，他蕴藏在心底的文艺才能，此时也得到了充发的发挥。1989年，为了庆祝玉门老君庙油矿成立50周年，他受命与人合作，写成《玉门石油史诗》的电视剧本，通过诗、歌、舞的表演，概括而生动地

反映了玉门油矿半个世纪波澜壮阔的战斗历程，拍成大型电视纪录片，并任导演。郑然如鱼得水，深感这是圆了少年时代立志从事文艺创作的梦，因此，特别投入。以玉门人，写玉门事，激情奔腾，近四十年在油矿的深切体会，无数的玉门人向大地夺油的战斗场面，浮现面前，大大地增强了导演的构思。郑然用他曾经执过指挥棒的手，而今执起话筒发号施令，把一组组精彩的镜头组成一部雄浑壮丽有声有色的画卷。这是他继 1958 年《玉门油矿大合唱》之后的一部力作。他的文艺才华深受玉门人赞扬。是年，郑然光荣地成为共产党员。

郑然，太眷恋大西北了。多次放弃了可以调来南方油田工作和享受天伦之乐的机会，铁下一条心，永做西北人，一直到退休。屈指一算，他从 1951 年到西安学习，到 1993 年退休，在石油战线上足足干了 42 个年头，这是生命中的黄金岁月呵，他把这段金灿灿的岁月，慷慨地写进了开发大西北的壮丽史诗中。

我们几个少年挚友，曾渴望郑然息肩后南来欢聚，在广州的珠江畔，在蛇岛的金凤树下，在故乡的曲水流觞亭里，促膝畅谈。回忆往昔峥嵘岁月，品尝今朝夕阳金晖。但，幻想毕竟像一串璀璨的肥皂泡，经不起轻风一吹，全部破灭殆尽！3 月 22 日夜，郑然在成都儿子家的电视机旁突然晕倒，耳朵出血，即送医院，经医生 8 个小时的全力抢救无效，于 23 日凌晨 2 时在医院逝世，年仅 68 岁！郑然有子女二：女南琦，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现为陕西国文律师事务所律师；子一力，在四川省石油公司工作。此时，我正在南太平洋的汶莱的画桌上，施朱泼墨，为一群教师批改中国书画习

作，筹备即将展出的诗联书画展。同样的夜晚，同样的灯光，此刻，郑然竟这样不辞而去。我本想回国后，把在国外讲学和举行诗联书画展的相片，整理成册，与他共享耕耘艺圃之乐。可是，当我无力地张开泪眼模糊的双眸，云天茫茫，郑然的英灵早已化成一缕青烟，轻轻地飘向天际，回旋在他魂牵梦绕的玉门关外——在他为之终身奋斗的石油井架旁……我从来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但此时却变得有点童真。假如彼此心灵都有一个感应器，随心所欲，那么，就让郑然英灵的青烟，随我的意愿，轻轻地飘到南国——飘到他少年时代的故乡的练江之滨的上空，鸟瞰着故乡今日琼楼鳞次栉比的新貌，亲吻这多情的土地的一草一木。郑然，魂兮归来！

红色村庄深溪七烈士

郑会侠

被省政府确认为红色根据地村庄的潮阳市仙城镇深溪村，在中共潮阳地方史上，是一个闪光的地名，是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前哨。位于大南山北麓的深溪鸡仔寮，山青水秀，地势平坦，树木参天，古色清幽，巍然矗立着一座高 6 米、宽 1 米多的纪念碑，宛似一把倚天长剑，格外引人注目，烫金的大理石碑文曰：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潮普惠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大刚、潮阳县赤卫大队队长刘明合等一批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举红旗，建农会，威震东江，英勇保卫东江革命根据地，浴血奋战，为国捐躯，名垂青史。在丰碑的正面，镌刻了刘大刚、刘明合、刘亚臣、刘眯目、刘镇坤、刘亚盾、刘德丰七个光耀千秋的名字。还有壮观的“深岭逶迤几多热血薰赤帜，溪泉长流无限风光慰忠魂”的联对，是对这个红色村庄古今的写照。这里已成为潮阳市革命文物保护点和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生于深溪村、党的优秀儿子刘大刚，他 7 岁入学，成绩超人，能写一手俊秀的毛笔字，后考入潮阳东山中学，1923